

与时代共命运，与民族同患难：抗战烽火中的复旦上医

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。70年前，日军侵华，山河破碎，风雨飘摇，国家有倾覆之危。全体中国人经历了八年浴血奋战，才有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复旦与国家民族同呼吸、共命运。1937年11月，数百名师生向内陆迁徙，西上庐山，再迁重庆，最后落脚北碚夏坝。留沪师生则在李登辉老校长的带领下，成立了上海补习部，遵循“三不主义”，支撑学校在险恶环境中坚贞不屈、弦歌不辍。

同一时期，1938年始，上医也经历了辗转迁徙，先过香港过越南

漫漫西迁路：与大夏组临时联大，上庐山，迁重庆，终定北碚

1937年，复旦大学发展为具有文、理、法、商4个学院、18个系科的大学，成为我国东南的重要学府。

“八·一三”日军侵沪战事爆发，复旦大学暑期学校被迫停办。上海军民英勇抵抗，9月初战事呈胶着状态。部分教职员倡议，仿照“一·二八”战时办法，在徐家汇复旦附中开学，但战事激烈，学生到校极少。

与大夏组成临时联大

不久，南京教育部派人来沪，复旦、大夏按教育部要求，组成临时联合大学，并将联大分为两部。

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，由复旦副校长吴南轩负责，大夏吴泽霖任教务长，迁往江西庐山，租赁普仁医院为校舍，何金芳旅馆等为宿舍，分文理法高等学院，实到学生

895人，教职员99人，11月8日开学。

第二部以大夏为主体，由大夏副校长欧元怀负责，复旦章益为教务长，迁往贵阳，以贵州省贵阳讲武堂为校舍，拟于11月开学。

11月12日，国民党军队西撤，上海沦陷。12月初，日军兵锋逼近首都南京，庐山震动，联大第一部决定下山，乘船溯江西上重庆，然后再转道贵阳，与第二部合并。

辗转入川，建校北碚

联大师生随校西迁者，共500余人，其余散归家乡，少数经武汉去延安，快利轮至宜昌后不能上航，师生在宜昌候船半月，分3批入川，12月到达重庆。

联大第一部到达重庆时，接得知贵阳校舍无着，遂在重庆借复旦中学菜园坝校址上课，第一学期

入滇，数年后又因战事内迁至重庆歌乐山。淞沪会战、滇缅公路、远征军队伍中都有上医人战地救护、战斗、牺牲的身影。九年于斯，经历风雨飘摇，受尽困苦曲折，艰难创业，办学育人，终于1946年秋顺利东返上海。

本编选自校档案馆的历史档案和历次编撰的校史，意在展现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复旦大学生存的艰辛，办学者不屈不挠的精神及复旦人爱校护校、努力升华学校的追求。虽然反映的是一校之历史，但它与当时社会大背景紧密相依，可说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缩影。

到1938年2月中结束。同月，在重庆校友协助下，吴南轩赴嘉陵江三峡一带寻找校址，确定在重庆北边150余里北碚对岸的夏坝(原名下坝，由陈望道建议改今名)。

2月下旬，师生分批到达，暂借黄桷镇河神庙(又名紫阳宫)为办公室，小学余屋为教室，煤炭坪为学生宿舍，王家花园为教师宿舍。

恢复复旦 艰难维系

临时联合大学自西迁以后，逐渐形成重庆联大第一部即复旦，贵阳联大第二部即大夏，循名责实，已无继续联合之必要。

1938年2月25日，临时联大在贵州桐梓举行第三次行政会议，决定自本学年第二学期开始，报经教育部批准，两校脱离关系。原在第二部任教务长的章益，由吴南轩推荐至教育部任总务司长。

上海补习部：李登辉校长的“三不主义”、四迁校舍、数改名目

1937年12月，复旦大夏联大第一部从江西再迁重庆，部分师生因各种原因未随同西迁，或返乡，或归沪。来年新春，在沪师生请老校长李登辉予以复校救助。

遂于2月借英租界北京路中一信託大楼四楼、五楼(今北京东路270号)为临时校舍开学，并向教育部呈请备案，名为“复旦大学沪校”。

2月23日开始正式上课。据顾仲彝《复旦同学会会刊》所记录，时有“教员44人，学生410人。除新闻、生物两系暂停外，其余4院11系照常办理，共开出课程90门，300学时，至6月25日学期结束。”

这年暑假，上海复旦大学有55

名毕业生。

四迁校址，数易名目

7月5日教育部令私立复旦大学，应以北碚部分为主体，上海部分改称补习部。

由于中一信託大楼地处闹市，不宜办学。1938年下学期，复旦租借法租界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)1726号房屋为校舍。该地环境比较幽静，但是法租界当局害怕日本帝国主义，坚决不准复旦在该处上课。

11月，三迁校址至仁记路(今滇池路)中孚大楼三楼。1939年4月，四迁至赫德路(今常德路)574号上课，学生人数上升至700左右。

提升教学科研质量，服务社会 历重重波折，两地复旦人终聚首

尽管北碚校区生活简朴，但五百师生精神振奋。课余之暇，尚能从事救亡宣传、进行社会调查，颇有一番新气象。

学校一面着力土木建设，一面抓住大后方人才聚集之良机，竭力延揽名流学者。曹禺、叶圣陶、方令孺、胡风、老舍、卫挺生、夏宗岱、初大告、赵燏恒、程沧波、沈百白、吕振羽、李蕃、任美镔、陈望道、叶君健、

吴觉农等大批知名学者先后应邀到任教，复旦的声音蒸蒸日上。

校方又根据大西南自然资源及社会急需，新增垦殖专修科，与中国茶叶公司合作办茶业专修科、茶业组、茶业研究室，创中国高校设茶业专业系科之先河，为抗战农业经济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。

之后，增设农学院，开办实验农场，研制“复旦白酱油”、“复旦番茄

酱”，成北碚家喻户晓的名牌产品。

抗战结束后，1946年5月，复旦重庆北碚校区准备东迁返沪。笨重物资、公文档案则特雇木船装载，直运上海。

东迁走陆路者，学校包租路局汽车分批东下，由陈子展等任总领队，从北碚出发，经成渝公路向河南进发，途经绵阳、剑阁、广元至宝鸡，换乘火车到南京，再转上海。



▶ 左为1944年复旦大学聘请老舍为文学院教授的文书。右为1946年时任复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的梅汝璈为赴东京审判，出任“远东军事法庭”的中国法官一职前，向校长递交的请假条。

图 / 资料

◀ 上海补习部曾在上海中一信託大楼今昔对比(今北京东路270号)。

图 / 资料

上医战时内迁小史

1937年上海沦陷后，上医的教学受到严重影响，一度中断。1939年初，学校决定内迁云南。内迁是分批进行的。同年9月，上医高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，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后，乘滇越铁路前往昆明，并继续为当地战事救护。

李登辉深居简出，仍极关心学生，他为毕业纪念册写序教育学生：“发挥牺牲与服务的精神以爱护其国家”，“切己复己之精神为牺牲与服务”，“尤要者为人须问心无愧”。

正是在李校长及全校师生的坚持下，上海补习部苦苦支撑，直至抗战胜利。

谷镜沂，这位中国病理学的奠基人，只好亲自用废酒精液蒸馏提炼纯酒精，结果把脸烧伤了。医学院实验用的玻璃器皿，也是教授们带着学生自己烧制。条件简陋，但教学质量一点也不差。当年的上医学生们回忆说，那是一个把解剖课能讲活的时代。

内迁之后，很多学生的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了，不少学生开始卖血，大家都是这么坚持着。直到1945年，胜利到来。1946年，上海医学院从重庆迁回上海。

文 / 杨震

▶ 左为1944年复旦大学聘请老舍为文学院教授的文书。右为1946年时任复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的梅汝璈为赴东京审判，出任“远东军事法庭”的中国法官一职前，向校长递交的请假条。

图 / 资料

◀ 上海补习部曾在上海中一信託大楼今昔对比(今北京东路270号)。

图 / 资料



淞沪会战中的上医战地救护队

1937年8月13日，淞沪抗战拉开序幕。战前，时任上医校长的颜福庆被推举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席，总负责全市救护工作。

他发动学校的广大师生和医务人员组织医疗救护队，奔赴抗日的前方、后方，为伤病员服务。

成立第一、第二救护队

此前，上医师生已有多次战地救护的经验。1932年一·二八事变爆发时，上海医学院动员全校师生参加战地救护。在闸北前线枪炮轰鸣时，大三学生陈化东右臂中弹受伤。

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，师生踊跃报名参加医疗救护工作，组成了第一救护队。

第一救护队是流动手术组，邵幼善、黄家骥医生任正副队长，成员有崔之义等内外科医生、护士、药剂员20余人。他们在无锡郊区设立临时医院，收容从上海水路、陆路运来的重伤员，进行扩创、石膏包扎、抗感染等处理，待

伤员病情稳定后再转移到后方。

10月，上医师生又组织了第二救护队，纪长庚任正队长，而副队长是五年前挨过日军子弹的陈化东。第一、二救护队在上海救护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救护工作，成为红十字会救护队的骨干力量。

战争迫使高年级医学生一夜之间变成了医生，他们每天要面对的，是无数的伤员，和在无麻药情况下大量的截肢和“刨”术。

11月中旬上海失守后，两支救护队改编为四队，撤退到内地。邵幼善、崔之义、纪长庚、陈化东分别任一、二、三、四队队长。

一、三、四队乘轮船撤往汉口。第二队留守南京，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两天才撤退，在武汉与其他三队会师。

抗战中的上医人

从9月20日开始，上医的枫林桥护士宿舍(外交大楼)改为伤兵分发站。从前线运到上海的伤员，少则每天300人，多则上千

夏坝的延安：后方的民主堡垒

抗战期间，重庆复旦大学是后方的著名民主堡垒。复旦的中共地下党员组成的“据点”，团结民主教授、进步同学积极开展斗争，被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认为是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。

1937年底，复旦西迁重庆以后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漆鲁鱼来校与地下党员沈大经取得联系，逐渐发展党员，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。1938年秋，随商学院、新闻系、经济系迁往重庆市菜园坝，地下党支部也分为2个。

1939年5月以后，为避开敌机轰炸，重庆市区的商学院等迁回黄桷镇，党组织又合并为一个。

1941年1月，国民党当局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，校内传出要逮捕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消息。在中共北碚中心县委的领导下，学校已经暴露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20余人全部安全撤离，留下的个别党员，暂时也停止任何活动。

1943年，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，在复旦成立了“据点”。这种“据点”，无名称、无章程、不定型。

“据点”成立后，在校内组织起一批进步学生团体，出版了《夏

坝风》、《文学窗》等壁报，并和友校合作创办了《中国学生导报》。

复旦“据点”还组织各种进步学生团体，如十月同盟、系联、德社、菊社、十兄弟、民主青年同盟、复旦核心、复旦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、北碚地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等等。

当时，参加各种进步团体的同学有120多人，团了700多同学，约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从1944年春天开始，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，国民党军队溃败，丧地千里。12月2日，日军前锋到达贵州独山，重庆震动。复旦“据点”发动全校师生讨论形势，名曰“国是讨论会”。

其时，中共中央南方局布置青年学生深入四川农村，复旦同学去了一批，并在农村建立起新的“据点”。

1945年春，新四军五师开辟中原解放区，要求南方局输送干部。复旦“据点”动员同学去中原解放区和其他解放区的，有100多人。

(原文摘自：《复旦大学百年志》编纂委员会《复旦大学百年志(1905-2005)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，第72至73页。)



▶ 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上医师生立即组织救护队赴前线参加救护工作。图为第一救护队在无锡战地进行手术的场景。

图 / 资料图片

◀ 1941年，重庆歌乐山，国立上海医学院校门。

图 / 杨震

特别感谢：
复旦大学档案馆为本报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和支持。